

高澍，我的好兄弟

○王贵如



一九八五年冬，高澍在青海省海西州文联座谈会上讲话

高澍，1944年9月出生，1968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毕业后分配至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任技术员。1978年7月调至海西州文联工作。1986年8月调至海西州广电局工作，历任文学刊物《瀚海潮》主编，海西州文联副主席，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西州广电局局长。1972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著有中篇小说《咸水湖淡水湖》《春风沉醉的晚上》，短篇小说《活佛》《琴心》等。著有小说作品集《活佛》。本文作者王贵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青海省文联主席、青海省广电厅厅长。

第一次见到高澍是1973年，在他所工作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他穿着一身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正全神贯注地在车间里干活，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

高澍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一辈中兄弟几人都是大学生。他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因涉嫌“反革命

案”而锒铛入狱，冤死狱中，母亲随后改嫁。少失怙恃的高澍只好跟着奶奶，生活在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叔父周南的家里。1968年大学毕业后，高澍被分配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大柴旦镇的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任技术员。我与他同一时期来到海西，在距大柴旦200公里的德令哈工作。因为年纪相当、经历相似、气味相投，我们很快成了相契甚深、无话不说的朋友，我到大柴旦出差会去找他，他来德令哈也会找我。

高澍毕业于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他不仅理工科根底扎实（我们常笑说他脑子里装了半个硅谷），而且涉猎广泛，知识面宽，用博览群书、杂学旁通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我学的是中文，涉及文学话题，他知道得比我多。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到袁枚的《随园诗话》，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九三年》，他如数家珍。读他的文章，其思想之缜密，文笔之老练，也使我不免有自叹弗如的感喟。高澍单纯透明，喜怒哀乐挂在脸上，有着嵇康式的迂直和耿介。他思维敏捷，出语幽默，常常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但有时也会莫名地忧伤。在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却默然不置一词，甚至会无视他人的存在，站起身来就走，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对于自己信赖和服膺的人，高澍礼敬有加，掏心掏肺；而对于他不大“感冒”的一些人，则常常以讽刺挖苦的语调，表达他的不满和不屑。记得有一次，

□ 怀念师友

我和高澍在路上走着，他忽然说：“给你提供一点小说素材吧：有那么一个人，当官的，他本来是坐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可一听到外面的脚步声，知道有人来找他，便立马正襟危坐，抽出笔筒里的红蓝铅笔，使劲地在书本的字里行间画道道；他本来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看见对面过来人了，就赶紧弯腰捡起地上废弃的一颗钉子，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不是浪费吗？不像话！’”说完，高澍哈哈大笑：“怎么样，够典型了吧！”我问他此公乃何许人也，他答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实有其人，非我杜撰也。”毫不隐讳自己的情感好恶，始终秉持自己的秉性、志趣和追求，这就是高澍。

正因为不苟流俗，不曲意迎合，哪怕是身处逆境，也依然不平则鸣，嬉笑怒骂，风标落落。所以，高澍后来的命运就不那么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高澍因为对厂里个别领导的行事、做派有意见，就意气用事地写了几张大字报，贴在大柴旦的街头和德令哈最显眼的人民商场门前，因而惹得一些领导老大不快。为此，高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运动开始以后，他在厂里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惩罚，接着，又被一纸调令调配到了都兰农机厂。还在他没去都兰之前，我们就有“截留”他的想法。但是在我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之后，一位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立即驳回了我们的请求：“留在州上，其他人可以考虑，高澍不行。据厂里反映，这是一个自高自大、目无组织的反党乱厂分子。正因为这样，才

要下决心把他调出来。”乖乖，“反党乱厂”，多大的罪名！看来我们人微言轻，这忙是帮不上的。幸喜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待高澍。当我把上述情况向时任州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平顺汇报之后，他摇了摇头，不无遗憾也不无感慨地说：“他（显然是指对高澍成见甚深的领导）就是权威？对他提点意见，就是有问题了？有本事，能干，就是大好，别的缺点毛病算什么。”这话放在今天，已经不算新鲜，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7年，还真给人以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感觉。“截留”虽然没有成功，但多少还是起到了一点铺垫的作用。1979年再调高澍，就没有多少磕磕绊绊了。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高澍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编辑，也是一个很称职的刊物主编。记忆深刻的是：高澍对作者真情关爱，尤其是对那些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但凡其作品有一定基础，高澍都会帮助他们修改润色，予以采用；即使不用，也都写上意见退还作者，或者把作者请到编辑部面谈。人们从高澍编过的稿件上，总能



1981年夏，青海省海西州文联工作会议，与会同志合影。第3排左2为高澍，前排右3为王贵如

看到他修改过的许多痕迹，感受到他甘为人梯的高风亮节。有的文章，整段文字甚至都经过了她的重新撰写。海西那时能够产生一个作家群，与文学刊物《瀚海潮》的创办大有关系，也与编辑部里有高澍这样慧眼识文、且对作者充满爱心的编辑大有关系。高澍对工作满腔热情，十分投入。《瀚海潮》创办之初，在海西州印刷厂印刷。州印刷厂以前只承印文件之类的印刷品，文学刊物用字浩繁，编排、装帧等都有更高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激光照排的技术，检字，特别是检寻一些生僻繁难的铅字，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师傅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稍一不慎就会出错。有鉴于此，在每期刊物发排之后，高澍一有时间就去检字车间，帮助工人辨认和查寻铅字。在州印刷厂的检字车间，我多次听到工人师傅对高澍的赞扬：“他现在是我们的师傅。”高澍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导向意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内一家文学刊物发表了一篇贬损鲁迅的文章，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引起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义愤和谴责。这篇文章一开始是寄给《瀚海潮》的，编辑部研究之后决定退稿。为了慎重起见，高澍又把稿子拿给我看。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和高澍做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从文章的具体观点，说到它的总体倾向，以至说到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讲过的一段话：“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最后，我们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刊物不发这篇稿子是对的。不发，是对鲁迅先生的崇拜和捍卫，是对读者的负责，也是对刊物的爱护。今日重提旧

事，只是想借此说明，在一些事关舆论导向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为刊物的一个负责人，高澍的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确的，处置也是妥当的。

以高澍所拥有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年富力强、文理兼通等个人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考研还是调离海西，另谋高就，大概都不是太难的事，可高澍却从来没有动过走的心思。直到1986年，北京一家媒体发来了商调函，准备调他去当编辑，这走与不走的问题才成了高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高澍拿着北京方面的商调函来找我，我问他：“留下来可以吗？”他回答说：“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走吧，过了这个村不一定再有这个店。”我想也是，高澍学校一毕业就来到海西，在海西已经待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一个回京的机会，我们应该尽量成全他的愿望。但鉴于高澍在海西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我作为州委副书记，不能擅自做主。这样一来，我便向当时的州委主要负责同志王汉民（1970级自动化）作了请示。汉民同志基本同意我的意见，他明确表示：“人才难得，我们先尽量挽留吧。海西缺人，尤其是缺像他这样的人。”随后，我便陪同汉民书记去了高澍的家里。我们恳切地向他表达了州委的挽留之意。高澍沉吟了一阵，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吧，那就不走了。”后来，高澍告诉我：“本来是下定决心要走的，可你们一来，不知为什么，要走的话却怎么也说出来了。海西对我不薄，我要是坚持一拍屁股走人，那就不够意思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真心挽留，竟然把高澍永远地留在了柴达木。在1987年8月9日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中，

□ 怀念师友

高澍不幸遇难。我是州上最早得知这一噩耗的人。州委宣传部的苏晓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是高澍出事了。我连在家里穿着的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跟上他就往医院跑。走进病房，看见躺在病床上的高澍头上脸上都有血痕，摸了摸他的胸口，胸口好像还热着，但围在旁边的医生说：“高澍的头上被汽车撞开了一个3厘米深、11厘米长的口子，脑颅破碎，生还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人的生命竟然会这么脆弱，生龙活虎般的一条汉子，眨眼之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望着床上再也醒不过来的高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高澍啊高澍，你才43岁，你的孩子才上小学，你怎么就忍心撇下他们扬长而去呢？你担任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兼海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才半年，多少人对你寄予厚望，你自己不是也正在调查研究，着手绘制海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美好蓝图吗？你不是还说，要积极争取省上支持，尽快将广播电视的微波线路通到海西，让海西人也看上青海台的电视节目，并要组织力量，好好拍一些反映海西山川形胜、人文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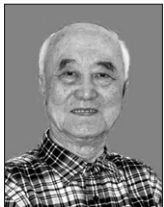
的纪录片吗？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将夙愿付之东流呢？

高澍的后事是我主持办理的，办得朴素而又隆重。我们都想用这种备极哀荣的方式，表达对高澍英年早逝的惋惜和悼念。高澍追悼会开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老是出现幻觉一样的疑惑，高澍真的死了吗？虽然这疑惑一闪而过，只是恍惚着。许多时候，我又觉得，高澍没有死，他随时都会推开房门，站在我的面前微笑。那一身半旧的中山装，那深厚的男性的嗓音。我无法相信这些俱作梦中容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高澍父亲冤案的昭雪，睽隔20余年的母亲也与他在武汉见了一面，加之工作顺利、前途看好，高澍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几年，是高澍活得最神采飞扬的一段时间，常常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看到他激情迸发的文字和豪迈的气概……这一切，于今都飘然远去、无影无踪，如何能不让人痛心入骨，几番垂泪！

高澍，我的好兄弟，愿你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庞文弟同志逝世 享年98岁



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原局长庞文弟同志，因病于2025年10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庞文弟，1927年1月生，河北清苑县人。1947年4月至1947年9月在清华大学工程委员会工作。1947年9月至1949年6月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6月

至1965年底，在中共北京市高校党委、市委大学部工作。1966年1月至6月，任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书记处书记。1971年底至1979年5月，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分党委书记，建工系、自动化系分党委书记。1979年5月至1988年，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1982年起，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会长、顾问。1994年11月离休后，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